

明清时期贵州诗学理论略论

陆跃升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凯里 556000)

[摘要]明清时期,贵州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孕育以及教育的发展,诗歌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学理论也应运而生。考究《黔诗纪略》所收录的诗歌及序和跋,其中点缀着许多见解精辟的诗学理论,如,“诗道情正”、“诗道情真”,以及关于贵州诗歌风格与贵州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诗论,等等。这些诗学理论为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在诗学理论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关键词]**诗学;诗缘情;情正;情真;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6)03-0060-03

DOI:10.13815/j.cnki.jmtc(pss).2016.03.014

一、黔中诗学理论研究概述

明清以来,地处边省地域的贵州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黔诗纪略》就收录了明代贵州的241位诗人的2406首诗作。到了清代,诗歌佳作可谓汗牛充栋,如,郑珍撰写的《巢经巢诗钞》就收录诗歌900余首;莫友芝撰写的《亭遗诗》八卷、《亭诗抄》六卷共收录诗歌1000余首,此外,还有大量民间诗人的优秀诗作。诗歌园地也人才辈出,出现了孙应鳌、周渔璜、陈夔龙、郑知同等备受世人推崇的杰出诗人。这些贵州籍地方诗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他们因特定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人格素养,对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体会和感受。他们新颖的诗学理论或散见于诗人诗作的序、跋中,或散见于诗人的作品中,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独特,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价值。由此,挖掘并收集边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士人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及创作经验,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诗学理论,为中国文学理论提供新鲜的血液,还有助于后代的诗歌写作及诗歌评论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进行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甚至能为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材料补充和理论支撑。

然而,贵州地处边省,交通不便,致使中原人士几乎不知贵州文化。如,清代孔尚任《〈敝帚集〉序》云:“予尝作《官梅堂诗序》,论十五国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于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1]但在《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巢经巢诗钞》等大量黔中诗歌文献的搜集整理之后,中原及省外所谓“黔中无诗”的偏见逐渐得到改观。如,梁启超在《巢经巢诗钞跋》云:“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能及,以余观之,立格选辞有独到处。”^[2]胡先亦云:“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传者。”^[3]贵州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数量在全国排前5位的依次为: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和彝族,这5个民族就占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82.09%。由于各民族存在独特而不同的风俗习惯、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致使贵州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但与此同时,也汇集了古今许多优秀诗学理论资料,为拓展学科视野,促进学术研究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二、诗道性情论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就有“言志”、“缘情”之分。《尚书·尧典》提出的“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4]这里的“志”,即指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过滤后形成的思想情感,属于理性范畴,即“发乎情,止乎礼义”。钟嵘在此基础上提出诗“吟咏情性”一说,他不仅强调诗人对情感的抒发,且进一步提出诗人情感的激发与产生依赖于客观外物的感召。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5]四时推移,景物转换,这些外物都会触发诗人的情感。这些诗学理论在中国诗学史上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明清的黔籍诗人在独特的历史、自然条件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新颖而独到诗歌创作理论。

首先,诗道情正。诗歌不仅要传达诗人的情感,而且要阐述这种情感在内容上的要求,即“情正”。而明代的孙应鳌在《禁语》、《海叟集》中则明确指出,要以道与学为诗之本,他云:“不知道不可以言诗,不知学不可以言诗,斯孔门诗教也。”他之所以把道与学作为写诗之根本,乃因“道”与“学”为“志之指微矣,是性情之枢管也。有其志后可以言诗。志端则性情得矣,性情得则声音谐矣。皆自然之所属,不可强也”。[6]23 孙应鳌认为,诗人必须首先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文学修养,这样,诗人被激发的情感也就必然符合礼义之规范,叙写的文辞就能惟妙惟肖地传达诗人的情感。故此,其自称“以余暗于学,无泽于道,乃不返其本质,顾力强于诗以求似,谬矣。”“忘形宇宙,收春肺腑,兴至景值,性触情流,吟咏成声,无斧凿痕。即造化可与通,庶物可与偕,学术治理可与该”。只有诗人的道德与学养修炼到一定高度,情感流露自然正,情感的表达也就自然。这也即是孔子所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傅龙光曾将诗厘为三品:其“得性情之正而合于古人言志之旨者,上品也”;其“或执一偏之性,纵一往之情,而不觉乖于性情之正者”,因其“犹有性情者存”,故居中品;“或摹仿声调,襞积故实,则为古人所役。或趋赴俗尚,谄悦人情,则为今人所役。或雕刻木石,搜讨虫鱼,则并万物所役”,性情全无,徒具形式,故居最下品。(傅龙光《〈吟我诗集〉序》)张美也说:“诗以达情,性情得其正,形诸歌咏,自为天地之元音”。其所云之“正”,就是指诗人“谆谆以民事、国家为念,尽力边疆、尽心王事”的思想。(张美《〈西凉集〉序》)其次,诗歌的生命力在于流露诗人真实的情感。越其杰在《改诗》、《苦吟》二首中写道,诗歌创作乃“直以明吾志,非徒解世颐”,“境真情自会,意到笔相随”,主张“独抒性灵”,反对“呕心”、“镌刻”的雕镂之文,认为“呕心常见少,信手或增奇”。傅玉书在《〈潘氏八世诗集〉序》亦曰:“境地遭遇既各不同,使诗必从同,则其人之真反不可见,无贵乎诗矣?然处必有所以处,出必有所以出。此固当不同而同者,于此不同,更无贵乎诗矣。”其所强调的是,境遇尽管不同,但情感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情感是诗歌的生命。

第三、诗人表述情感的方式要自然。诗人有了真实的感受,必须以恰当的形式、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达。陶廷杰《〈水云山人诗草〉序》云:“诗以道性情,不在词藻,恐失真性情耳。”即华丽的词藻有碍于真性情之传达。诗歌创作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而在于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黔籍诗人傅玉书在《跋〈唐汉芝诗〉》一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于诗歌情感的表述方式的精辟见解,对诗歌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说,“工部称太白以清新,或疑其知太白者浅,非也。盖疑之者自浅之也?言清新耳,彼以孤子为清,雕镂为新,是又不徒浅也,二者固相悖而不可合矣。夫富人贵家,绮罗珠翠。日更月易,适见其陈陈而已。若藐姑射之神人,不事工顰妍笑,而人之见之,固不厌也。然则不求新而自新者,岂不以其清哉!故犹是景也,自我言之,而非人人所能言;且犹是言也,自我出之,而仍非人人所已言。此其故有在景与言之外者矣。”他认为,诗歌创作要“不事工顰妍笑”,强调诗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高度评价唐汉芝诗歌所具有的自然的特点。“吾友唐汉芝诗,色泽风容,不为孤子,而其气自清;和易圆转,不烦雕镂,而其境自新。盖其性真,风骨有存于诗之先者,斯可以言清新矣。”[7]黔籍诗人关于“诗道情正”、“诗道情真”是诗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对于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诗歌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自《诗经》始,中国诗歌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从四言诗至五言诗、七言诗,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新诗等,诗歌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前人的成果。如,屈原的《楚辞》就吸收了《诗经》中的“比兴”等多种艺术手法;而鲍照的诗歌具有对《楚辞》艺术成就的继承与发展的明显特点;唐代诗歌的辉煌成就则是齐梁“永明体”孕育的结果。黔籍诗人傅玉书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源”与“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古代诗歌均源于《诗经》,“古诗与唐体裁各异,且各有盛衰偏全之分,而要必源于《三百》,归于《三百》,则其义一也。”[6]33 同时,就各个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的“源”与“流”进行了具体的考辨。他说:“古诗正始于苏、李,盛于建安、晋、宋,衰于梁、陈。方其盛也,班、张、曹、刘、阮、郭、颜、谢,各有所长,而得其全者靖节也。唐诗正始于陈伯玉,盛于开、宝之际,及中、晚而渐衰。然就其盛时,曲江、太白、王、韦、高、岑、东川、道州之徒,亦与中、晚诸家各擅其胜,而得其全者少陵也。”[7]傅汝怀进一步探究了诗歌源于《诗经》的依据。他说:“诗首《诗三百篇》,本乎性情,至圣以‘思无邪’蔽之”。所以,《诗三百篇》“本乎性情”,且得性情之正,故为古今诗学之正源。(傅汝怀《〈潘氏八世诗集〉序》)梁彬对《诗三百篇》何以成为诗歌之源也有具体阐述。他在《〈云台山人诗选〉序》云:“作诗不准诸《诗三百篇》,譬犹高墉百尺,失其基址;洪波万顷,涸其本源;要皆浮衍不根之词而已耳。况《诗三百篇》之删,不尽为颂祷而设,其美恶讽刺,皆的性情之正。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诗人之本旨也。”《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诗歌的起源,乃在于《诗经》准确地抒发了古代诗人“真”而“正”的情感,且其写作语言、修辞等艺术技巧至今为后代诗人的圭臬。

四、地域环境与黔中诗学

刘师培说：“五方地气的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8]所以，地域的差异造成了各地诗人风俗、性情的明显不同。而诗人的风格、性情的不同直接导致诗歌具有明显的个体性、地域性特征。傅玉书曾提出，“‘境地遭遇’之差异而导致‘言怀述事’之迥异。”可见其对诗歌的深切理会与领悟。由此，不仅看到诗人诗歌的相同之处，即“言志抒情”，更重要的，是他能结合自身的写作经验觉察出诗人境遇差异对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独特的民族风情、独特的气候特征，以及独特的历史孕育出诗人独特的气质，也必然造就出与中原迥异又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并反映出西南边疆人民的特殊情感和特殊风物。同时，傅玉书结合自己所熟悉的诗人的境遇与历史上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愚考山人乡举二年而明亡，当是时，车书未同，桂藩自粤入黔，尚记其叙，以诗证之，盖尝外荆令守，内列省郎，再黜再起，难知引疾，是以忧世嫉俗，固不异于美之在唐。及海宇既一，人庆升平，而山人义不复仕，躬耕养母，则又略似渊明。”他从时代背景、身世遭遇角度出发，把山人、桂藩与子美、渊明进行比较，具体可感，充分表达了其对诗人诗歌与境遇变迁的关系这一诗歌理论的感悟。黄万机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指出：“贵州作家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自幼感受着大山的雄伟与奇崛之气，对其志趣和文学作品的风格气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黔中的地形地貌与繁华都会、江南水乡无法相比，但黔中雄奇险峻之美的“大山地理”却是江南塞北所没有的。黔中诗人长期生长在这险峻雄奇的大山中，浸染着大山的灵气，大山的形象、意蕴使诗人耳濡目染，逐渐熔铸出诗人坚毅顽强的性格特质，因此，黔中诗人之诗歌多具有阳刚、奇崛的诗歌风格。郑珍对此进行过比较详尽的论述。他在《〈播川诗钞〉序》中说：“余尝过桐梓，观大娄山，经其东南，曾盘崔嵬，蹙地隐天，草木烟云，郁郁苍苍，绵数百里莫测所蕴积。意其穷深雄阔，塞明裂坤，地尊五岳之气，必有负玮抱者，或外来，或本产，出其精芒光焰，歌啸恣肆乎其间，然后与兹山相称。……今阅吾友晓峰赵君《播川诗钞》，于余所言与兹山相称者，乃始欣然谓若有可信。”（《贵州通志·文艺志》卷十六）在此，郑珍结合自己观赏大娄山的奇崛景色的切身体验，得出《播川诗钞》就是贵州雄奇险峻山水孕育的结果。陈夔龙亦云：“吾黔僻处万山中，去上京绝险远，风气号为陋嗇，土生其间，率皆质直沉静，不屑屑走声逐影，务以艺鸣于绮靡浮器之世。”（陈夔龙《〈含光石室诗草〉序》）黔中的“大山地理”培育了诗人“质直沉静”的性格。同时，黔中的山水还孕育了诗人率真自然、野古浅直的特征。千百年来，黔中诗人生活在这险峻而翠绿之山，清澈而透明之水的秀美环境中，涵养于纯朴本真的民情风俗里，较少受到外界喧嚣都市虚伪造作之风的浸染，故人情质朴、真挚。因此，黔中诗人以抒发真情为诗歌创作的至境，并以此品评诗歌的优劣高下。如万大章云：“顾率直不兢于侪辈，弃置十余年，不复作，亦不复读。惟师友感事寄兴，情真语挚，悲壮淋漓，辄爱不释手，且不费诵习而自能历久不忘。”（《贵州通志·文艺志》卷十七）万大章通过自己的阅读体会，道出了黔中诗歌以抒发“真实”情感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清]田榕. 黔南丛书(第三卷)[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4).
- [2]梁启超. 梁启超书话[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3]胡先. 胡先文存[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5.
- [4]朱自清. 诗言志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5]吕德申. 钟嵘诗品校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6]汪文学. 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7).
- [7]陈田,等. 黔诗纪略后编(卷十一)[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8]劳舒.刘师培学术论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黄永堂,点校.贵州通志·艺文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2).